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南京国民政府对 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

段金生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013048755

D693.6
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南京国民政府对 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

段金生 / 著



北航

C165847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D693.6
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段金生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7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4507-6

I. ①南… II. ①段… III. ①国民政府-边疆地区-行政管理-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D6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2445 号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

著 者 / 段金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王琛珺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关志国 宋淑洁

责任校对 / 师旭光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507-6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21.5

字 数 / 329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
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编 委 会

主 任 马大正

副 主 任 晋保平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方 铁	方素梅	吕余生
刘晖春	刘楠来	孙宏开	李世愉
李国强	李斌城	杨 群	宋月华
张振鷟	周建新	贺圣达	晋保平

总 序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西南边疆项目”）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管理。“西南边疆项目”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其中基础研究类课题成果结集出版，定名为“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以下简称“西南边疆研究系列”）。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

“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 2008 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

“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

2012 年 10 月

目 录

绪 论	(1)
一 近代中国的边疆政治生态	(3)
二 近代边疆认识的演变	(9)
三 边政概念的阐释	(15)
四 学术史的回顾	(20)
五 研究思路	(31)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	(34)
第一节 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环境	(34)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	(46)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广西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59)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60)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84)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及其政治实践	(102)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演变	(102)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藏的政治策略及实践	(118)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西南边疆农业发展的规划与政策	(167)
第一节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自然环境及经济状况	(168)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农业发展政策	(176)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实业发展规划与实践	(207)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实业机构的设置、实业法规的制订	(208)
第二节 国民政府中央机构对西南边疆的实业规划与实践	(211)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西南边疆的交通发展规划与实践	(243)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铁路规划与实践	(244)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公路规划与实践	(260)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航空、水道的 规划与实践	(277)
第七章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教育规划与实践	(286)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方针及其行政机构	(287)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西藏的教育规划与实践	(296)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云南、广西的相关教育 规划与实践	(301)
余论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315)
后记	(331)

绪 论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 22 年，这一历史时期，我们一般将其称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实现了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从而逐步开始了现代党治政治体制的转型。而南京国民政府正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对中国政治形态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也相应地作用于边疆地区。与传统王朝国家文化边疆认识的思维迥异，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边疆认识有着明确的边界概念，国家对边疆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然而，这一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主权国家对边疆所应拥有的合法权利，在近代中国却遭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一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领土的侵逼；二是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构建过程中的诸多滞障。

在现代民族国家视野中，边疆是国家领土主权的当然范围，边疆已经由王朝国家视野下可有可无的蛮荒之地，逐步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建立了党治政体模式，对民族国家的构筑产生了积极意义。当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身存在的诸多弊病，又增加了民族国

^①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 1 页。



家构筑的艰巨性。

在中国加快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同时，民国时期的边疆危机却更加迫切。并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由王朝国家视野中的“边缘”性区域逐步演变为关系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关键区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已经有评论认为：“边疆问题是省政问题，其实还是整个国家问题。”^①因而，加强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治理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战局（指抗日战争——引者）影响，西南边疆，骤形重要”。^②随着西南边疆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地位的逐步上升，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投入了相当精力。

以往学术界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问题时，关注的目光较多集中于蒙、藏、新及西北地区，对西南边疆地区关注不足。^③而已有的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本书的西南边疆仅涉及西藏、云南、广西等3个与邻国接壤的省区，而民国时期的贵州、四川、西康等地理、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西南边疆，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治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多系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缺乏宏观视野。而即使是宏观论述，部分论著又有提前预设框架之嫌。例如，很多论述对西南边疆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重要性的变化过程、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不同省区之认识与政策的差异性问题较少涉及，多模糊地以“民族同化”政策、西南大后方或其他表述进行分析，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各省区的政策既有共性，但在共性之下又隐含有极大的差异。因而，有必要在借鉴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西南边疆的治理问题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

不过，在探讨此一问题时，须对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政治生态、边疆认识的变化进行总结，以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同时，笔者以为边疆治理问题实属于边政研究的范畴，本书也对民国学术界颇有争议的边政概念进行了疏理辨析。

① 《云南日报》社论：《云南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10月14日。

② 《云南日报》社论：《云南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10月14日。

③ 段金生：《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

一 近代中国的边疆政治生态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或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合作与对抗，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政治势力间的博弈，是王朝国家模式下边疆治理的重要特点。晚清以降，伴随着西力与西学影响的不断加深，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边疆问题面临着古代社会千年未遇之变局——威胁对象从传统的边疆地方势力对中原王朝政权的挑战，转变为西方列强通过各种方式蚕食中国边疆领土，其性质由内地与边疆地区各派势力的争斗，演变为国家与国家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正如有西方学者曾论：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始，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在觊觎中国边境的领土，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不断升级，中国的边疆越来越不稳固。^①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定》（1864年）、《中英续议滇缅条约附款》（1897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的中国边疆领土。面对着列强在边疆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晚清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其治边政策，逐渐改变了中前期“羁縻之治”这一传统的治边模式，借“清末新政”之机，推行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政策，试图以此整合中央与边疆地方的关系，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晚清政府先后设置了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行省，开始直接介入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并在内蒙古逐步设立了州、府、县。这是晚清时期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的重要变革，但由于得不到边疆地方势力的认同，加上列强挑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此举反而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体化政策难以贯彻并最终流产，同时旧有的“羁縻之治”模式也陷入瘫痪，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的关系日渐疏离。^②

① [美]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394页。

② 参见冯建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蒙藏新疆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第193、195页。



晚清这一“放弃固有的统治模式，通过对周边地区积极地行使权力，使其与内地一体化”，“试图将中央一元化的权力自上而下渗透到社会末端”的政治行为，^①一直贯穿于近代中国社会之始终。因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试图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是部分边疆地区由于西方强权力量的破坏，对中央的离心力逐渐加强。这构成了近代中国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的突出特点。

传统中央权威解体，新的民族国家的中央权威仍然在艰难的重构过程中，西方列强侵略的脚步加快，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势较晚清更为恶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北京政府在边疆行政区划上，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后改为西康）、宁夏、青海等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上，在外蒙古与西藏采用由中央派遣驻地官员代表中央施政而清朝旧制仍然施行的双轨制。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的整合频繁，地方实力派割据称雄的政治格局逐步呈现，列强之间对华基本维持均势状态，边疆地区也相继过渡到民主共和制。但在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自晚清已经酝酿的边疆分裂势力活动步伐加快，突出者为外蒙及西藏问题。在沙俄的支持下，民国初年外蒙宣布独立；在英国的支持下，民国时期西藏的主权及领土问题日趋复杂，“麦克马洪线”的出台是这一阶段西藏问题严重的典型表现。然而，近代边疆危机达致高潮的阶段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结束了北京政府时代纷繁的政权更迭局面，中央政治权威的重构也较之北京政府有了明显进步，但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势因受国际政治因素之影响而进一步恶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危机日深一日，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达至极点。“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这几年中国全部边疆显然交了多事之秋”^②。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各国对中国还维持均势状态，对中国的侵略尚存互相猜忌之心，虽然对中国无不垂涎三尺，但又相互戒备

① [日] 茂木敏夫：《清末近代中国的形成与日本》，孙江译，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57页。

②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第2页。



以免成为众矢之的，表面上仍表示维持“领土完整”“机会均等”的原则。“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夺东北，各国在华的均势局面被打破，于是“纷起效尤，对于领土之侵略，更明目张胆，不复有顾忌。法占九岛，英窥班洪，既嫉南疆独立，又助藏军内犯，一时山雨欲来，风云变色”。^①这一时期因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边疆各省形势十分逼人。

辽宁、吉林两省，与朝鲜为邻。自吉林东部图们江下游土字碑起经过吉林东部、黑龙江全省、蒙古全区，一直到新疆的帕米尔高原，都和苏联相交界。新疆西南部、西藏和西康与印度为邻，云南大部与缅甸相邻，云南东南部及广西则与越南为邻。日、俄、英、法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边疆地区承受到直接压力，“可以说，每一个边疆省区都有问题”。首先最严重的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问题；其次是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由内政引致外交，西藏问题进而引起西康问题；再次是新疆问题和云南问题。在新疆地区，苏联修筑了与中国边界并行的铁路；在云南，英国的铁路也修筑到了边界之外，而法国的铁路深入滇省心脏，控制了整个云南的经济活动，加以边界纠纷，云南的政局常阢陞不安。在广西，法国修建了和边界并行的铁路，而且还修建了支线以达广西省边沿要卫，并租借了广州湾。^②列强对中国边疆虎视眈眈，通过其控制的与中国边疆地区邻近的殖民地而窥视中国疆域，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方位渗透，破坏中国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有效管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外力的侵略是产生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孙中山在1894年所言的“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④的政治预景基本变成现实。

西方力量的进入，迫使中国卷入了近代化进程。西方力量自近代以来由沿海入侵中国，并在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工业化，形成了在中国社会

① 凌纯声等：《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编者序言》，南京正中书局，1934，第1页。

② 蒋君章等：《中国边疆地理》，重庆文信书局，1944，第3页。

③ 邓珠娜姆：《中国边疆之路》，第4页。此书据其内容判断，为民国时期出版，但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详。

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第19页。



的“初始势力”。它们一方面会摧毁或打击中国原有的社会组织及活动方式，另外一方面也受到中国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与沿海各地的“初始势力”相比，西方学者将边疆地区的西方力量称之为“次级势力”。^①虽然西方列强在边疆的“次级势力”较之在沿海的“初始势力”薄弱甚多，甚至会因边疆社会环境之影响而产生异化，但毕竟对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西方近代生产力方式开始在边疆地区传播，有利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但铁路、无线电等近代新式物质方式的不断发展及传播，民族与国家等近代观念相继涌入，亦形成了影响复杂的双刃剑。民族国家的构筑是近代国人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重要目标，其总的方向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然而，由于西方列强利用边疆地区复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对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西藏、新疆三省区进行窥视，甚至在抗战时期也借口“民族自决”来煽动边疆分裂^②；加以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因素损害了边疆原有民族与宗教上层人物的既得利益，使得部分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上层人物歪曲民族国家之正面含义，并受西方列强的蛊惑而谋求分裂边疆，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造成了边疆地区的严峻形势。

近代以来，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大致呈现出一种减弱、加强、弱化的循环趋势。具体而言，当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严重，边疆分裂势力嚣张时，清中央政府通过逐步在新疆、东北设省，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但随着近代中央政府权威的逐步式微，边疆与内地关系更趋复杂。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即陷入南北对峙、军阀混战局面，中央权威之重构仍然举步维艰。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度仍然有限。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静止”状态，社会内部结构较为稳定。人类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影响。中国边疆各地，“多为山岳沙漠地带，交通建设困难，尤以西北部分，偏

①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2页。

② 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委员会编印，1942，第1页。

居边地，绝鲜注意新路之建筑，迄今尚闭关自守；至于西南方面之交通，年来虽有相当之进展……尚感不足，亟应力求扩充”。^① 边疆地区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及落后的生产力方式，导致了多样社会生产形态的存在。民国时的西北边疆很大一部分是游牧社会，还有不少地区是半农半牧的定居社会，西南边疆则停滞在不发达的农业社会。^② 当生产力未发生质的社会变革之前，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历史上的边疆社会形成了与内地迥异的经济、社会、文化形态及意识，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严重影响着中央政府权威在边疆地区的有效性。

民国时期已经有学者指出：“边疆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边疆交通的问题。”^③ 可以说，边疆交通的落后是影响中央权威的重要因素之一。整个近代中国的交通除沿海通商大埠渐具近代化外，内地交通仍不发达，边疆地区尤甚。帝国主义在与中国边疆地区相邻的殖民地不断兴修铁路，使得从内地到边疆各地，入新疆可取道苏联西伯利亚，入西藏可绕道印度及尼泊尔，并且速度比从中国内地相连省份逐省出发还要快。这一交通落后并畸形发展之状况，深刻影响着边疆与内地的政治及社会关系，使得“国家非但不能占到利益，反而受累”^④，表现为：中央政府权威的有效威慑大为减弱；边疆各地方实力派得以利用各种条件，发展成为割据势力，中央政府对此无力过问；西方列强利用这种政治状况，加快对边疆分裂势力的挑唆，边疆地区的离心力或有增强。

20 世纪 30 年代，有西方学者以东北为讨论重心，指出铁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没有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它反映了西方影响的进一步深入，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干涉，还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干涉。这一态势在边疆各区域中，以东北地区尤为显著。东北地区的铁道建设较中国其他地区发达，故而在若干方面中国内地与东北的联系较以往更加密切；但由于外来政治、经济力量的进入，东北地区又开始与内地分离。“中国现在要和其旧地理范围以外的政治力量作斗争，那些外来政治力量建立

① 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第 2 页。

② 卫惠林：《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边政公论》第 6 卷第 3 期，1947，第 9 页。

③ 王沿津：《泛论边疆交通》，《边政公论》第 1 卷第 2 期，1941，第 41 页。

④ 王沿津：《泛论边疆交通》，《边政公论》第 1 卷第 2 期，1941，第 43 页。

在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上，是旧日边疆的传统方式不能与之争衡的”^①。可以说，边疆地区交通的畸形发展，就是“旧地理范围以外的政治力量”作用的体现，这既使边疆产生了分裂倾向，同时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实现迅捷有效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包括军事、政治等多层含义在内，这是边疆地方实力派能够游离于中央权威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的中国虽然一直在谋求重塑统一国家的中央政治权威，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危机不断，加以西方力量介入等多重因素之制约，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较弱，中央与地方关系十分复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东北地区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具体行政权力仍被奉系势力掌握。蒙古地区因受近代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中央政府对外蒙一直无力过问，而内蒙地区则存有部分具有分裂倾向的王公贵族势力。新疆自民国建立直到盛世才离新为止，地方的实际权力先后为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长期掌控。南京国民政府经过努力，虽然基本实现了对甘肃的统治，但与甘肃臂指相连的宁夏、青海，却又基本被马家军阀所控制。西南边疆地区，南京国民政府虽然经过努力实现了对贵州的控制，但云南、西康仍为地方实力派所掌握。西藏地区情况更为严重，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一直为控制西藏不断努力，但因交通不便、民族与宗教问题复杂，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使西藏的分裂活动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显得特别突出。

边疆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是近代边疆社会与政治状况的重要特点。晚清时期，在边疆地区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新疆地区就因其特殊而重要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复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一直是近代国人关注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② 边疆地区居住着满、蒙、回、藏、苗等民族，虽然这些民族在许多地方已经与汉族杂居并逐步融合，但大部分仍保留着其固有的生活方式，维持其固有的民族团体，使用其原先的语言文字，在社会政治组织上保留着传统的王公、土司等特殊制度。^③ 边疆这种民族与宗教情形特殊复杂、民族语

①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第99～100页。

② 段金生：《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1938，第1页。